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嘉靖前期诗坛研究 (1522-1550)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丛 书

Academic Library

余来明 著

Wuhan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嘉靖前期诗坛研究 (1522-1550)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丛
书

Academic Library

余来明 著

Wuhan Universi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嘉靖前期诗坛研究(1522~1550)/余来明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6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ISBN 978-7-307-06973-2

I. 嘉… II. 余…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1522~1550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1163 号

责任编辑:陶佳珞

责任校对:王 建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31.75 字数: 450 千字 插页: 3

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6973-2/I·359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国家“985”工程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创新基地建设成果

序

陈文新

来明的博士学位论文《嘉靖前期诗坛研究（1522—1550）》入选武汉大学学术丛书，即将出版。欣慰之余，遂欣然命笔，就我所了解的若干情况说几点感想。

来明选择以明诗作为学位论文选题，在他是“素业有专攻”。记得还是在2000年，由我主持的《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明文学部二》进入编纂的冲刺阶段，就让几个研究生协助我搜集材料，其中明代中后期诗文部分由来明负责。几年下来，他差不多把《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等大型丛书中的明人别集都过了一遍，积累下大量材料，最后编入《明清文学分典》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2003年考上博士，在设计论文选题时，我建议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文献优势，从一个较小的角度切入，在精深上做功夫。从最后完成的情况来看，来明不负期许，其论文被校内外审阅专家一致评为优等。

来明选择明诗作为研究对象，显示出自觉“预流”的学术姿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部分学者有感于明诗长期游离

于学界主流研究视野之外,提倡对明诗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加上学位教育规模的扩大,学位论文选题的范围迅速延伸,明诗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一代研究者的重视,产出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然而,在相关研究成果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弊病,不少研究仍满足于对明诗及其相关问题作一般性的描述,类似对某一作家作品进行介绍的文章屡见不鲜。来明选择以嘉靖前期诗坛作为研究对象,在我看来是抓住了明诗发展的关键环节。从时间上来看,这一时期处于前、后七子之间,在文学史上被关注的主要是以唐顺之等人为代表的唐宋派,诗歌方面未能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从明代诗史演进历程来看,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通常被纳入前、后七子复古思潮的整体格局当中,没有被作为独立的发展阶段,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将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曲折历程简单化了,不利于我们深入理解明代诗史。

选择以嘉靖前期二十余年的诗坛作为研究对象,来明具有相当明确的问题意识。他在全书开篇,便指出了重建明代诗史所存在的薄弱环节,并就此作了深入的思考:一、关于研究资料的掌握。“面对明清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论者在谈论某一问题时,涉及的文献往往大同小异”,“相关讨论很少深入到文学事件内部,对某些文学现象的理解常以清人的评论为依据,未能摆脱故有的陈套”。二、关于论述的方式。以术语、观念的对比替代历史的叙述,“为了彰显某一文学思潮的优越性、进步性,将不同文学观念和理论术语的对比简化成对‘落后’文学思想的批判,文学史叙述的合理性就不免受到损害”。由此出发,来明提出的问题是:“在经历第一次‘失败’的复古之后,代表复古的文学思潮何以一而再地在诗坛复兴?公安派、竟陵派这类在当今文学史叙述中被视作‘优秀’、‘进步’的文学思潮,何以在明末清初的话语世界中却常与明亡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前后评价呈现的巨大反差,是否仅出于文学观念的变迁?或是借批驳前人以达到自我标举的目的?”这是一个对建构整个明代诗史都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来明由此切入,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理解嘉靖前期诗坛,通过钩稽大量文献,并在文献之间建立了切实可信的联系,嘉靖前期的诗学思潮与诗坛景

观，在作者笔下有条不紊地展开。

从全书的章节结构来看，作者主要从三个层面考察嘉靖前期诗坛：一、在经历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复古运动之后，诗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复古思潮的发展趋势如何，复古诗人是否仍占主导地位；二、既然复古思潮和复古诗人已成为嘉靖前期诗坛发展的次要力量，这一时期的诗坛，诗人结构和群体风尚又表现出哪些特征；三、嘉靖前期诗坛的主流思潮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以上三个方面，不仅体现了作者明确的问题意识，也反映了作者开阔的全局观。用来明的话说，即“通过梳理史料，考察明诗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环节，探寻明代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力求更准确地把握促成各种流派交互盛衰、各种风尚流衍变迁的历史脉络”。具体来说，引言部分主要围绕两个重心展开：一、重新解读“李何之争”，提出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建构明诗展开的历史语境。二、系统梳理后人对嘉靖前期诗坛的看法，从明代诗史角度对嘉靖前期诗坛进行界定，概括嘉靖前期诗坛在明诗演进历程中的特殊意义。第一、二、三章从不同侧面分析“前七子”复古思潮在嘉靖前期的运行态势。第四、五两章对嘉靖诗坛的格局加以描述。第六、七两章对嘉靖前期的诗学理论、诗学思潮及理学对诗学的渗透作具体分析。其中如通过考察明代诗史视野中徐祯卿《迪功集》评价的变化，彰显嘉靖前期诗坛主流思潮的异动；通过分析嘉靖前期被视为复古诗人的黄省曾、袁宏的诗学统系和薛蕙、严嵩的人生志趣，揭示复古运动后劲的弱化与转向；以南北力量对比的变化反映嘉靖前期诗坛风尚的变迁；以京城、南京、吴中三大中心概括嘉靖前期诗坛的格局；对嘉靖前期诗坛六朝、初唐、中唐、性气等诗学思潮的辨析，都有所创见，颇多新意。

全书看似仅对嘉靖前期诗坛展开研究，视野所及，事实上包含了对整个明代诗史演进历程和诗坛风尚变迁的思考。就主流而言，明代诗史以古典主义思潮的汹涌澎湃为基本特征。它的一系列前后贯串的流派，如闽中诗派、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广五子、几社等等，绵延相续，与整个明代相始终。在此背景下，从考察风尚

转换时期的诗坛景观和诗学理论入手，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当一种曾占据诗坛主流的思潮成为非主流后，出现的种种批评、反对之声，有助于我们对该思潮作进一步深入的认识，通过考察嘉靖前期的各种反复古、非复古思潮，可以使我们对弘治、正德诗坛的复古思潮有更准确的把握。二、前、后七子之外，尚有众多另立旗号的反对派，如吴中四才子、公安派、竟陵派，均以复古思潮为其存在前提，在此前的明诗发展过程中，是否也曾有过同样的理论诉求。全书对嘉靖前期诗坛的研究，部分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全书从大处着眼、小处着笔，与作者多年来的学术积累和研究工作是密不可分的。攻读博士期间，为了拓宽学术研究的视野，来明在参与《中国文学编年史》编撰时，选择了此前未曾涉足的元代文学。元明两代，无论在文学还是文化方面，其联系都要超过明清。如在明代逐渐走向成熟的科举制度，其考试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形式，在元代就已确立；明代文学中颇为盛行的理学气息，事实上在元代文学中也已普遍存在；明初文学的主要思潮和主要流派，都是在元代文学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明代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崇唐”心态，在元代文学中也已有突出表现。一系列的事实足以说明，要对明代文学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视野必须超出明代之外，将元明文学结合起来研究，进而上溯至唐宋以前，下延及清代以至近代。本着这一思路，来明在博士毕业以后，将精力放在研究科举制度和“历史文化语义学”方面。

来明治学，秉承而又不囿于乾嘉学风。就本书而言，《嘉靖前期文学家年表》，体现了扎实的朴学功力；具体论述中，能精熟地驾驭材料，为其所用，反映出较强的理解和把握文献的能力。从以往的情形来看，立足文献资料，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他已经形成的治学路径。

一直以来，我指导学生，有一个基本理念，即：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不能仅靠老师传授知识和方法，还须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不断操练。来明自2000年跟我做研究生，几年来，先后参与了《中华大典》、《中国文学编年史》、《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编纂，学术水平不断提升，他独立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也获得立项。目前又在从事博士后研究，用力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探讨。以来明的积累和专注，他在学术上一定能够做出更加引人注目的贡献。“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谨以此祝福来明。

是为序。

2009年4月3日于武汉大学

目 录

引 言	1
一、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理解嘉靖前期诗坛	2
二、明代诗史视野中的嘉靖前期诗坛	13
第一章 诗坛已无李梦阳	39
一、复古运动主将淡出诗坛	43
二、李梦阳《迪功集序》的文学史意义	59
第二章 复古运动阵营的弱化与转向	72
一、“吾辈亦可攢辘一崆峒”——李何后派的分化及其诗坛地位评估	73
二、诗人本自吴中来：黄省曾与袁宏的诗学统系	79
三、不继复古做诗人：薛蕙与严嵩的人生志趣	91
第三章 嘉靖前期复古理论的拓展	102
一、“诗不得舍声调而专气骨”	103

二、诗史之辨与“抑杜”思潮的兴起	119
第四章 诗人群体的迁徙与诗坛格局的重建	128
一、多变的政治风云与诗坛格局的演变	129
二、南北力量对比变化与诗坛风尚的变迁	148
第五章 嘉靖前期诗坛的三大中心	161
一、京城诗坛	163
二、南京诗坛	176
三、吴中诗坛	187
第六章 嘉靖前期诗坛的动向	196
一、没有六朝，何来盛唐？——嘉靖前期六朝、 初唐诗风的复兴	200
二、“更继钱刘做后尘”——嘉靖前期中唐诗风 的流行	225
第七章 “诗者，道之华”——嘉靖前期理学对 诗坛的渗透	248
一、诗儒之辨	249
二、清新警拔中蕴无限理趣——嘉靖前期的性气诗派	257
三、“古今诗人，未有如康节之工者”	266
结 语	277
附 论 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	281
附录一 嘉靖前期文学家年表 (1522—1550)	298
附录二 20 世纪明诗研究概述	444
主要参考文献	455
人名索引	473
后 记	491

引 言

文学史的演进由什么力量推动？文坛风会的变迁、文学流派的兴替如何完成？四库馆臣论及明代文学的嬗变，将明代近三百年的文学进程归结为平正典雅、沉博伟丽两种风格的交互胜负。《四库全书总目》卷170《怀麓堂集》提要云：“盖明洪、永以后，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正、嘉以后，文以沉博伟丽为宗，其究渐流于虚矫。虚矫之极，不得不返而务实。二百余年，两派互相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①四库馆臣的这一评述，只是就总体趋势概括明代文学的整体面貌，而一旦涉及具体的文学进程，其间的内在驱动力和具体的发展状况、更替始末，显然远比四库馆臣所说的更为复杂。本书以嘉靖前期诗坛为研究对象，从小处着眼，其基本思路是：通过梳理史料，考察明诗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环节，探寻明代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力求更准确地把握促成各种流派交互盛衰、各种风尚流衍变迁的历史脉络。

^①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90页。

一、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理解嘉靖前期诗坛

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 (1903—1995) 谈及如何描述文学史的演进时, 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编写某一个时期的文学史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叙述的问题: 我们需要辨出一种传统惯例的衰退和另一新传统惯例的兴起。为什么这一传统惯例的变化会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发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用一般的术语是不能解释的。^①

在具体研究中, 明代诗歌发展历史的叙述困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 研究资料的掌握。从已有的研究来看, 无视基本“事实”的现象仍然存在, 面对明清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 论者在谈论某一问题时, 涉及的文献往往大同小异, 丰富的史料被束之高阁, 相关讨论很少深入到文学事件内部, 对某些文学现象的理解常以清人的评论为依据, 未能摆脱故有的陈套。(二) 以术语、观念的对比替代历史的叙述。术语、观念的变迁固然是文学研究的重点, 然而如果为了彰显某一文学思潮的优越性、进步性, 将不同文学观念和理论术语的对比简化成对“落后”文学思想的批判, 文学史叙述的合理性就不免受到损害。从“五四”时期扬公安、竟陵而贬复古, 到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为复古所作的辩护, 无不从这一角度予以立论。而对明代诗歌演进的具体历史情境, 却置而不论、避而不谈。例如, 在经历第一次“失败”的复古之后, 代表复古的文学思潮何以一而再地在诗坛复兴? 公安派、竟陵派这类在当今文学史叙述中被视作“优秀”、“进步”的文学思潮, 何以在明末清初的话语世界中却常与明亡的主题联系在一起? 前后评价呈现的巨大反差, 是否仅出于文学观念的变迁? 或是借批驳前人以达

^① [美] 韦勒克、沃伦著, 刘象愚等译: 《文学理论》, 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第 307 页。

到自我标举的目的？诸如此类一系列问题的解答，有赖于明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从明代诗歌演进的轨迹来看，同一问题在不同时代的展开，包含了不同时期诗人对各自时代文学思潮所作的当下思考，诗学观念的变迁建构了不同时代的诗学性格；同一诗学概念的提出，往往有各自不同的文学文化背景，包蕴不同的时代内涵。例如，“前七子”与“后七子”核心复古主张的契合，一方面是出于文学观念的前后承继，师法前人以开创新的文学发展道路，在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二者所处文学环境（即“前七子”之前的成化、弘治文坛和“后七子”之前的正德后期、嘉靖前期文坛）存在某种相似之处，是他们选择同一理论体系的内在原因。由此出发，文学研究须切入历史的具体形态，在文学演进的历史情境中理解文学现象，解读文学事件，把握文学进程。对于资料丰富的明清文学，这一研究理念的确立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理解文学的必要性，《复斋漫录》对陶渊明诗歌的解读，不无借鉴意义：

《文选》五臣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诗云：“渊明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思悦考渊明诗，有以甲子题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宁有晋未禅宋，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甲子而自取异哉？矧诗中又无有标晋年号者。余观《南史》渊明传，亦云：“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明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来矣。^①

《复斋漫录》所言尽管只是事实的考辨，却为具体的文学研究提供

^①（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0页。

了启示：对作品立意、作家品格的把握，涉及的不仅是艺术分析问题，其中包含了对作家的生活时代、处世理念和政治立场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考察。换句话说，对于文学创作的正确理解，离不开对文学展开情境的把握，惟有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把握文学进程，论析文学现象，方能获得正确的解释。

清人章学诚（1738—1801）以史家眼光，立足历史研究的普遍原则，强调以“统同年谱”的方法展开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鄙意欲仿唐、宋诗文别集各著年谱之义，将入选之诗，作一统同年谱。取汉迄明凡二千年，横排甲子干支，而以朝代年号系之。其入选诗人生卒年月有可考者，附于其下；无可考者，取其姓名见于史鉴何年，或其诗题、诗序有年月者，附于诸文；再取其年时事，裁取大纲，约略为辞，以列于格，可与诸家之诗互相印证，不特为诗家证明义旨，亦兼可为史传正其流讹，为功艺林，亦自不鲜。^①

章学诚所说的“统同年谱”，与今世的文学编年史颇为类似。在他看来，以系年方式综括诗人、诗作的“统同年谱”在“为诗家证明义旨”和“为史传正其流讹”两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对此，陈寅恪也持相同看法，认为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对文学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有重要意义：“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②

在明诗研究中，钱谦益是个关键人物。他研究明诗，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深思论世，置身于百年以前”，通过梳理第一手文献

①（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二《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75页。

②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1章《长恨歌》，《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

资料，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把握诗人诗作。《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皇甫金事淳”条云：

自王元美《艺苑卮言》记吴中盛事，谓太原兄弟并擅菁华，汝南父子嗣振骚雅，至今海内流为美谭。而中表因依，研席应求，文章问学，风气密移，非深思论世，置身于百年以前，未能或知也。余故详著之，以表微焉。^①

诗坛风会流衍变迁，在时间之流中，那些引领时代风尚的诗人诚然应为诗史所铭记，而那些身处时代风尚之外高标独立的诗人同样不应被历史所遗忘。钱谦益在明诗研究中对皇甫淳、黄省曾这类作家予以详著而表微，固然是要借以批评李梦阳、李攀龙等复古诗人，但他提出的“非深思论世，置身于百年以前，未能或知”的见解，却对后人研究诗史具有方法论意义。只有在深入考析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体贴、观照研究对象，把握明诗发展的脉络，才能正确理解明诗演进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现象。以下通过对李梦阳、何景明文学论争这一问题进行辨析，说明进入文学演进的历史情境对于理解具体文学事件的典范意义。

因为发生在“前七子”复古运动两位重要领袖之间，“李、何之争”从一开始就引人瞩目。对于二人论争的解读，大致存在两种认识：

（一）文坛权力下移之后，李、何二人为争夺文坛盟主而走向对立。明代以来的论者多持此种看法。如汪道昆《青萝馆诗集序》云：“人言李、何故相欢，卒以名高为敌国。”^②汪道昆所谓的“人言”，说的大概是王世贞。王世贞《艺苑卮言》卷6云：“何仲默与李献吉交谊良厚，李为逆瑾所恶，仲默上书李长沙相救之，又画

^①（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13页。本书所引《列朝诗集小传》均据此本，后引仅标卷次、页码。

^②（明）徐中行：《青萝馆诗》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本书所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所收著作，均据此本，后引仅标作者、书名及卷次。

策令康修撰居间,乃免。以后论文相掎击,遂致小间。盖何晚出,名遽抗李,李渐不能平耳。”^①即便是关系密切的朋友,并肩作战的同志,也可能为了名利而倒戈相向。李、何二人早年一起共倡复古,一起与刘瑾集团作斗争,关系颇为密切,后来变得疏远。二人关系转变发生在何时?其中原因何在?不排除为争夺文坛盟主的可能。

(二) 李、何之间发生论争,缘于二人文学观念的分歧。在王世贞看来,才性差异造成文学观念的分歧,是二人发生论争的重要原因:“仲默才秀于李氏,而不能如其大。又义取师心,功期舍筏,以故有弱调而无累句。诗体翩翩,俱在雁行。顾华玉称其‘咳唾珠玑,人伦之隽’。”^②李、何二人尽管都提倡复古,但在创作风格上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复古运动的深入,他们在认识上产生不小的分歧。所谓因论文而“遂致小间”,确有其事。李梦阳、何景明二人文集中,保存有二人反复论难的书信。其间语气,显得不那么平和。由文学观念之争而引发意气之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常有之事。对此,胡应麟的解释是:何景明之所以提出“舍筏”之说,对复古理论予以修正,原因在于李梦阳“多拟则前人陈句”,模拟之弊多于式则之功。何景明所要舍弃的,并非“前七子”复古理论的基本规范,而是李梦阳诗文理论、创作中的“乌狗糟粕”^③。胡应麟的辩护,与后来袁中道“中郎以不忍世之害历下也,而力变之,为历下功臣”^④之意相近。完善“前七子”复古理论使之更趋合理,消除由于单一的模拟导致的僵化,是何景明与李梦阳反复论难的根本原因。

《明史·文苑传》综合二说,概括认为:“景明志操耿介,尚

①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6,《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46页。本书所引《历代诗话续编》所收诗话均据此本,后引仅标书名、卷次及页码。

②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第1045页。

③ 参见胡应麟《诗薮》内编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页。本书所引《诗薮》均据此本,后引仅标卷次、页码。

④ (明)袁中道:《阮集之诗序》,《珂雪斋集》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62页。